

经典重释: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哈姆雷特》解读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 湖南 永州 425199)

摘要:从文学伦理学的视野重新解读文学名著,不仅有利于全面认识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而且为深入阐释作品的主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以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文本伦理语境为环境,通过分析戏剧中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来阐释作品的伦理特征。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哈姆雷特》;复仇;文本伦理语境;伦理身份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5)03-0067-04

引言

《哈姆雷特》历来被公认为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品,这部戏剧也被认为是西方戏剧史上的奇观。自1877年以来,西方文学学术界每隔12天就会有1篇或1部研究《哈姆雷特》的论作问世。至今,在学术界所召开的莎士比亚研讨会上,《哈姆雷特》依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有关该剧研究的方法大致有7个方面:(1)运用社会历史学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2)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所体现的男权观念;(3)运用精神分析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所体现的恋母情结;(4)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历史意识形态;(5)运用现代语言学批评方法,分析作品的语言魅力;(6)运用生态伦理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所蕴涵的伦理道德意识;(7)运用权力话语理论阐释作品的权力主题。无疑,这些研究方法对深入理解作品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借助文学伦理学的理论,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文本伦理语境为环境,通过分析戏剧中的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来阐释作品的伦理特征。

一、文本伦理语境的营造

关于《哈姆雷特》所反映的伦理道德问题,早在20年前就有学者论及。然而,文学的传统道德批评与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有着明显的区别。学者聂珍钊对此进行过辨析。他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道德批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历史客观性,即文学

批评不能超越文学历史。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的文学的基础,文学的现实价值就是历史价值的新发现。”^{[1]14}因此,要分析戏剧的伦理特性,必须考察作品中出现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对文学的伦理环境的分析。伦理环境就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1]19}聂先生在此所说的伦理环境是指社会环境或时代环境,它是文学存在的基础。然而,这种环境其实质是一种广义上的伦理环境,或者说是一种外部环境,而本文所说的伦理语境是一种狭义上的伦理环境,特指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伦理事件所产生的文本环境,或者说是作者精心营造的一种人为环境。相对于社会环境或时代环境而言,文本伦理语境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既可能是文学作品中伦理事件产生的条件,又可能是伦理事件组成的要素。换句话说,文本伦理语境具有复合型特征,既可为文本伦理事件的产生提供背景条件,其本身又可成为文本伦理事件的组成元素。因而,分析文学伦理语境,对我们解读文本的伦理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哈姆雷特》是以丹麦的一个传说为蓝图虚构而成的,即便作者依托了当时的时代环境,但毕竟《哈姆雷特》不是历史事件的再现,而只是折射。因此,当人们试图通过剧本本身来分析考察当时英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时,不应仅仅局限于英国的历史事实,还应重新考察作品中出现的具体语境,即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伦理语境。因而,分析戏剧的伦理语境成为我们解决作品伦理

特性的首要问题。所谓文本伦理语境是指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某一伦理事件发生时,相关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针对戏剧而言,文本伦理语境表现为戏剧冲突产生的具体文本环境。其中,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是文本伦理语境构成的重要因素,它是演绎戏剧情节的动力。

莎士比亚在戏剧中以哈姆雷特的复仇为主线,以雷欧狄斯和福丁布拉斯的复仇为辅线,三线交织,共同演绎戏剧的情节。毋庸置疑,复仇构成了戏剧的主题。虽然复仇表面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其实质却是一种因利益冲突而破坏特定伦理秩序的理性行动。只要人类存在,复仇就不会消亡。复仇不仅是一种文学的主题,也是一种文学的母题。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再到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作父兄弟》,无不表现出浓厚的复仇主题。然而,无论是出于有意识还是出于无意识的复仇,都标志着对社会现有秩序的一种反叛,都是个体生存意识的极端表现。

就复仇类型而言,它既可表现为“血缘式”复仇,也可表现为“非血缘式”复仇。顾名思义,“血缘式”复仇是指复仇双方存在着某种直系或旁系血缘关系,如父子、母女、兄妹等;“非血缘式”复仇是指复仇双方没有血缘关系,如君臣、朋友、夫妻、同事等。除此之外,复仇还可以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类型,笔者将之称为“血缘+非血缘”式复仇。复仇双方既存在血缘关系,又存在非血缘关系。这种复仇类型看上去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矛盾,实际上却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不仅现实生活中存在这种复仇类型,而且许多文学作品也描述了这种复仇类型。前者,如现代家族企业所发生的凶杀案件大都属于这种复仇类型;后者,如《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复仇。作品中的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既存在血缘关系,又表现为君臣关系。戏剧第一幕第二场克劳狄斯、哈姆雷特和葛露特之间的对话可以为证:

国王:来,我的侄儿哈姆雷特,我的孩子——

哈姆雷特:(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王: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雷特: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下晒得太久了。

王后:好哈姆雷特,抛开你阴郁的神气吧,对丹麦王应该要和颜悦色一点^{[2]27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为了替父亲复仇,谋害其父的真凶克劳狄斯必须偿命。可是,与雷欧狄斯和小福丁布拉斯的为父复仇不同,哈姆雷特为父复仇必须背

负2种罪名——“弑父+弑君”。然而,这2种罪名都因违背伦理受到世人强烈的斥责和严厉的惩罚。如此,哈姆雷特的复仇就具有了明显的双重性特征。这对于崇尚人文精神,高呼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的哈姆雷特来说,弑父与弑君这种有违人伦、泯灭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他内心最为鄙视的人类行为。而如今,他不得不因复仇而改变已有的初衷。因此,他才会发出:“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2]380}遭遇到这样的理想挫折,面对残酷的现实,哈姆雷特绝望地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座牢狱,“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很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对于你们它并不是牢狱;因为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对于我它是一所牢狱。”^{[2]298}这种发自肺腑、声嘶力竭的话语正是哈姆雷特陷入绝境深处时的痛苦心声,也正是他无法逾越的人伦常规,但又不得不亲手破坏这种伦理秩序时的苦闷呐喊。终于,当这种双重性复仇将之压抑到其内心所能接受的极点时,备受人伦秩序煎熬和桎梏的哈姆雷特便以身试法,杀死了克劳狄斯,完成了复仇。而同时,他也因自己违背人伦的行为受到了最为严厉的惩罚。由此可见,哈姆雷特为父复仇实质上是戏剧最重要的一个伦理事件。随着事件的出现和发展,哈姆雷特、克劳狄斯、葛特露各自所处的地位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便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彼此之间所形成的本已为大众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也都随着哈姆雷特的复仇而逐步瓦解。如此一来,莎士比亚精心巧妙设置的伦理语境不仅增添了戏剧的可观性和可读性,更重要的是,让作品富有了鲜明的伦理色彩。

二、伦理身份的转换

主人公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延宕,历来是莎士比亚研究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换言之,《哈姆雷特》之所以历久不衰,并非戏剧情节的曲折性,而是哈姆雷特延宕的复仇问题。“哈姆雷特在其母亲嫁给克劳狄斯之后,他的伦理身份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他变成克劳狄斯的儿子和王子。这种伦理身份的改变,导致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出现了伦理障碍,即他必须避免弑父和弑君的伦理禁忌。哈姆雷特对他同克劳狄斯父子关系的伦理身份的认同,是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中出现犹豫的根本原因。”^{[1]20}聂珍钊先生的这一评论真可谓一语中的。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因而,任何一个

人只要他没有脱离社会群体,就会拥有与之相称的身份。在众多身份中,伦理身份是人类社会性存在的基础,任何人在其出生之时就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了某个家庭的成员,并因此被赋予了相应的伦理身份。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家庭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被赋予的伦理身份是不可随意更改的,因为被赋予某一伦理身份的人有其行事的准则,而这种准则正是维持家庭、社会和国家正常运作的基石。一旦出现违背人伦的言行,家庭的存在就会出现危机,社会秩序也会随之遭到破坏。古今中外,各个民族为了维护正常的伦理秩序,都会制定相关的法律或法规,甚至有些民族还出现了图腾禁忌。“在人类文明之初,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在古代社会,人类通过禁忌对有违公认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禁忌也是道德的起源。”^[1]¹⁸克劳狄斯弑兄篡位后,哈姆雷特的身份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叔侄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哈姆雷特已是人臣和人子,本应该履行和遵守相应的伦理秩序,即便这种遵循是被迫的,但这种以禁忌形式出现的伦理秩序有其应有的威慑力。哈姆雷特肩负的双重伦理身份严重制约了他日后复仇的行为,这种背负着弑君和弑父双重罪名的复仇,必将会因违背已有的伦理秩序而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和阻止。因此,在这场人伦秩序的较量中,哈姆雷特不仅要与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社会秩序相抗衡,而且还要与自己本有的伦理意识相斗争。于是,双重的伦理身份使其日后复仇过程中背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具有双向性特征的力量。一方面,是一种破坏伦理秩序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维护伦理秩序的力量。力量双方相互牵制而形成一种张力,并且随着剧情的发展而不断增强。当剧情发展至高潮时,这种张力就会将备受人伦秩序煎熬的哈姆雷特推向崩溃的边缘。面对令其窒息的伦理张力,哈姆雷特最终只有以身试法,杀死克劳狄斯,完成复仇。然而,哈姆雷特在解除伦理张力的同时,也将为自己有违人伦的行为而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这一切恰好是因其伦理身份的转换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伦理效应。

剧情一开始向读者讲述了2位守夜的士兵在城墙上目睹老国王鬼魂出现的事情。随后,霍拉旭将此事告知了哈姆雷特。以下是他们之间一段简短的对话:

霍拉旭:殿下,我想我昨夜见到了他。

哈姆雷特:见到?谁?

霍拉旭:看见先王,您的父亲。

哈姆雷特:先王?我的父亲?

霍拉旭:不要吃惊,请您静静听我把这件奇事告诉您^[2]²⁷⁶。

2个疑问句式的出现,真实表现了哈姆雷特得知此事时一种惊讶和半信半疑的神情。一方面,鬼魂之事有些匪夷所思,他不敢贸然相信;另一方面,他又想借此弄清父亲死亡的真相,寻求真凶,完成为父亲复仇的伦理职责。于是,一场围绕复仇与反复仇的生死较量逐渐浮现出来。伦理身份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伦理秩序的变化,还意味着伦理身份背后所隐匿的权力话语的改变。即由原有的叔侄之间的权力话语转换为现在的父子、君臣之间的权力话语。正如米切尔·巴瑞特所言:“对福柯而言,分析的对象从权力作为一种绝对物,转向了用权力关系来论述权力。”^[3]¹³⁶也就是说,君臣、父子这种伦理身份便是克劳狄斯与哈姆雷特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相对于哈姆雷特来说,克劳狄斯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操纵者。他不仅顺利篡权成为君主,而且还因此从叔父转变为继父,伦理身份的变迁使得他在使用话语时,时刻体现出一种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当然,哈姆雷特作为权力的受动者,也没有逆来顺受。相反,他时刻都在为求证父亲鬼魂之言的真实性而努力。为何如此?因为哈姆雷特始终都保持着清醒的伦理意识。“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分辨善恶的能力,就如同伊甸园里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那样,能够分辨善恶。没有人头,就不可能有人的伦理意识;没有伦理意识,就不能分辨善恶;不能分辨善恶,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4]⁴作为16世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青年和德国威登堡大学的高材生,伦理意识在哈姆雷特内心深处是根深蒂固的。他不仅拥有区分善恶是非的能力,而且还能在复仇行动中保持和运用这种能力。“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现在我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2]³⁴⁵因而,在其复仇的过程中,当他通过伶人上演戏中戏的方式确认继父克劳狄斯就是杀父真凶时,他的一个言行再次表明哈姆雷特时刻保持着清醒的伦理意识。

“此刻已是众巫出游的深夜,墓园里的枯坟均已敞开,地狱也在吐散瘟疫於人间。现在我可痛饮热血,可去执行那能令白昼战栗骇人工作。且慢,让我先去见我的母亲……呵,我的心呀,别让我丧失天良,别让尼罗王之亡魂潜入此胸怀。我可残

酷,但不可无良心。我可用语言的利剑来刺戳她,但决不用真刃。我的舌头与灵魂此时应效仿那伪君子:无论我用多么严厉的语言来谴责她,我的心灵将不容允我把它们履现成真。”^{[2][33]}

一方面,得知事实真相的哈姆雷特,愤怒不已,要痛饮热血,对弑兄篡位、强娶其母的克劳狄斯给予实际意义上的严惩。因为叔父的这种违背人伦的行径是罪恶的表现,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轻饶放过。所以,哈姆雷特扬言要去执行令白昼都战栗的骇人听闻的工作——刺杀真凶克劳狄斯。另一方面,哈姆雷特对于母亲的改嫁,并没有像对待克劳狄斯那样,以实际行动惩罚其罪行,而是只用较为过激的言语表达了自己的悲愤。“懦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明白母亲改嫁杀父仇人并非真心,而是就范于克劳狄斯的淫威。所以他希望自己不能丧尽天良,干出杀害母亲这种违背人伦的事情。由此可见,正是清醒的善恶是非观念让热火中烧的哈姆雷特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和处理问题。

然而,伦理身份的转换让哈姆雷特在实际复仇的过程中受到了双重伦理秩序的束缚。无论是弑君还是弑父,都是对已有伦理秩序的破坏和践踏。可是,为了复仇,他又不得不如此行事。于是,哈姆雷特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做出一种令其于心不忍的痛苦抉择,以身试法,刺杀恶毒、残忍的克劳狄斯,同

时,哈姆雷特也为此行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哈姆雷特这种选择是一种典型的伦理选择。经过选择,他完成了复仇的心愿,也接受了最为严厉的惩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姆雷特的悲剧命运,在于伦理身份的转换让其在2种伦理力量的矛盾纠缠中,身心憔悴,疲惫不堪,最终以死复仇。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确实表明了作品浓厚的伦理特征。

三、结论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视域对其进行阐释,以“为父复仇”这条伦理主线所营造的文本伦理语境为环境,以哈姆雷特伦理身份的转换所产生的伦理效应为立足点,不仅分析了哈姆雷特在其复仇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清醒的伦理意识,而且还阐释了哈姆雷特在其复仇中所表现出来的延宕背后的实质,即双重伦理身份所形成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具有双向性特征的力量对其行动的制衡作用。总而言之,按照文学伦理学的理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艺术。《哈姆雷特》无论是文本伦理语境的设置,还是伦理身份的认同与反认同所产生的伦理效应,都充分体现了作品浓郁的伦理特性。这也充分说明了莎士比亚作为他人难以企及的戏剧家,其艺术创作所具有的思想深邃性和艺术独创性。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1): 12-22.
- [2]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六种[M]. 朱生豪, 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4.
- [3] MICHELE B. 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6): 1-13.

Re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 Discussion of the *Hamlet* From the View of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ZHANG Neng-q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ongzhou 425199, Hunan, China)

Abstract: Re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ethics, but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way for fur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from the view of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ain ethical line of revenge for father in the context creates the ethical situation. Through the Hamlet ethical identity convers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thical trait of the drama.

Key word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Hamlet*; revenge; ethical context; ethical identity